

茅于軾

無悔

的历程

茅于軾 岑科 李高阳 / 著

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与历史进程紧密相连，
尽融一位工程师出身的经济学大家对平等自
由的不懈追求，他的思想、人格与行动，堪
称中国公民社会之典范。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家 世 | 1 |
| 我的爸爸妈妈 | 1 |
| 童 年 | 4 |
| 第二章 成 长 | 7 |
| 抗战中的磨难 | 7 |
| 南开中学 | 13 |
| 大学教育和学问之道 | 16 |
| 第三章 立业成家 | 23 |
| 从事铁道事业 | 23 |
| 爱人赵燕玲 | 27 |
| 第四章 悲惨岁月 | 32 |
| 稀里糊涂成了“右派” | 32 |
| 下放山东几乎饿死 | 35 |
|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抄家 | 37 |
| 发配到大同机车厂 | 40 |
| 第五章 转向经济学研究 | 47 |
| 离开铁道研究院 | 47 |
| 改变我命运的人 | 48 |
| 开眼看世界 | 51 |
| 在澳大利亚教书 | 57 |
| 学术总结 | 61 |
| 第六章 社会活动 | 66 |
| 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| 66 |
| 扶贫与办学 | 68 |
| 渐入老境 | 70 |
| 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展望 | 71 |
| 第七章 学界往事 | 7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经济学探险 | 75 |
| “如兄之友，如父之师” | 79 |
| 怀念杨小凯 | 83 |
| 留美经济学会 | 88 |
| 第八章 播种观念 | 91 |
| 《择优分配原理》的背后 | 91 |
| 经济学传道士 | 94 |
| 站在风口浪尖 | 97 |
| 第九章 知易行难 | 102 |
| 天则在民间 | 102 |
| 一起为穷人办事 | 106 |
| 公民社会行动者 | 111 |
| 第十章 生活本色 | 115 |
| 和青年人在一起 | 115 |
| 陌生的朋友 | 120 |
| 平凡是真 | 124 |
| 第十一章 经济原理 | 127 |
| 择优分配原理 | 127 |
| 附：茅于軾对择优分配原理的讲解 | 132 |
| 一般均衡与“金钱万能” | 134 |
| 价格万岁 | 138 |
| 交换创造价值 | 142 |
| 第十二章 财富本质 | 146 |
| 财富创造原理 | 146 |
| 穷国与富国的差别 | 148 |
| 投机的利弊 | 151 |
| 财富如何被消灭 | 155 |
| 第十三章 制度解析 | 159 |
| 平等——市场制度的基石 | 15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有特权即无人权 | 162 |
| 民主的核心是宽容 | 167 |
| 社会科学中的“牛顿定律” | 171 |
| 第十四章 道德思考 | 178 |
| 从经济的角度看道德 | 178 |
| 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不足 | 184 |
| 建立新的道德观 | 188 |
| 附：茅于軾对市场经济中非自利因素的讲解 | 192 |
| 人生的意义 | 198 |
| 第十五章 未结束的争议 | 202 |
| 为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办事 | 202 |
| 反对 18 亿亩耕地红线 | 206 |
| 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 | 209 |
| 赞同高校学费涨价 | 213 |
| 人民币升值的障碍何在 | 217 |

第一章 家世

当我回顾一生的经历时，大多数岁月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印象，只有一些零星片断倒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，这些片断既有决定我人命运的大事情，也有无关紧要的小事。这确实是人类记忆之谜，它是如何选择信息，在大脑中长期地载录下来。但这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。

我曾说，希望再有机会活 60 年，以弥补过去被耽搁了的岁月。这说明了我对生活是满意的，是乐观的。虽然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，但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已经逆转。而且即使在最悲惨的年代里，生活中仍旧有幸福的一面。

我的爸爸妈妈

我爸爸名叫茅以新，妈妈名叫陈景湘，都是 1902 年出生，爸爸比妈妈大 6 个月。爸爸活到 1990 年，妈妈活到 1992 年。妈妈生我们 4 个兄弟姐妹，我是老大，老二叫茅于杭，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，老三叫茅于兰（女）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（2008 年因老年痴呆和忧郁症去世），老四叫茅于海，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，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。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。

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，是中国的桥梁专家，是我的二伯父。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。大伯父叫茅以南，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因食道癌去世了。他早年留学日本，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。我们一共有 19 个堂兄弟姐妹，大房有 8 个，二房有 7 个，再加我们这房 4 个。这 19 个叔伯兄弟中出了 3 个右派，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。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。我还有一位姑妈，叫茅以纯，她毕业于金陵女大，学钢琴。她很不幸，在 1939 年因伤寒去世，终年 36 岁，她的丈夫叫戴般若，生了两个儿子。戴般若很有才，智商高而情商低，潦倒一生，于 1969 年 2 月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去世，终年 68 岁。

我的祖父叫茅乃登，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。曾著文《江浙联军光复南京》，记述了 1911 年 9 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。他死得很早，只活了 60 多岁，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，那时候我们在杭州。爸爸特地去南京奔丧。他没有给我留下

什么印象。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，鼓励我写好字。每天要写一张大字，她在上面批圈，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。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，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，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。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，终年 70。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。虽然家境贫困，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。她的 3 个儿子都是留学生，女儿是大学毕业生。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。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，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，生活过得很舒坦。

我爸爸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，他原在唐山交大，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。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，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。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。回到南京老家，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。本来应该很赚钱，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，公私业务繁忙，对修车的需求很强。但是国民党官僚倚仗权势，强买强卖，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。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，反而被抓去坐牢。后来他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（浙赣铁路的前身）工作，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。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。从那时起，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。他主持浙赣、粤汉、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，去日本购买机车，去美国引进“二战”的战后铁路物资。开办柳江机厂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，一丝不苟，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，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。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，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，1950 年广州解放后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，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（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）。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。但是他得不到信任，有职无权。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满腔热情，但是没有可能做成什么事。后来政治运动不断，更谈不上做事了。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，还当过政协委员，待遇按副部级享受。

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参与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，各个国家的都有。各国的标准不同，车辆就无法连接。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。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，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，

不能统一备制。标准化的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做了几十年。他在工作作风方面，廉洁奉公，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，对人富有同情心。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，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。

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。陈章觉得我爸爸不错，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。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。陈家也是苏州名门。我的外祖父陈希濂（聆诗）是光绪时的进士，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。陈章教了一辈子书，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。大舅舅陈霆锐学法律，也是美国留学生，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，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，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（相当于人大代表）。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。

我妈妈一生多病，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，维持全家的生活，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。她机智幽默，爱护子女。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，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。我们刚结婚时，我妈每次出门访亲都要我爱人陪同。大概有点得意显比的意思，带一个极漂亮的儿媳，自己脸上有光。我妈晚年听力视力都出问题，近乎又聋又瞎，和外界的沟通非常困难，只有我爱人能够跟她沟通。我妈是无疾而终，最后死在医院里。当时我爱人给她梳头，忽然就不行了。

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，都有留学生的背景（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），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、平等、开放、崇信科学。我们家不拜祖宗，不看风水，不信教，但是也不反对别人信教。我们家里书特别多，其中外文书也多。有一本 **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** 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书，我会唱其中的每一首歌。我看五线谱是自学的。后来学小提琴，更是离不开五线谱。我儿子也喜欢音乐，我的孙女儿茅尚彬能弹一手好钢琴，在学校比赛时经常得奖。

童年

我母亲家在苏州，嫁到我父亲家，那是在南京。起先和祖父母住在一起，那是一个大家庭，有大伯伯一家，当时二伯伯茅以升在杭州建钱塘江大桥。我妈吃不惯南京的伙食，正好我爸开汽车修理厂失败，杭州铁路又需要人，在我满月的时候就搬去了杭州，在杭州一住就是6年，我在杭州上了小学，但是只读了不到一年就因我爸工作的调动离开杭州。

在杭州时我们住在竹园棚，离街道不远的一座两层楼。上街要走大约10分钟，经过一段荒凉的野地。夏天时路上有许多蛇。竹园棚里有一个小池塘。有一次二弟茅于杭跌入池塘，我用一根竹竿救他把他拉起来。其实那个池塘并不深，大概淹不死人。

同在杭州的不光有茅以升一家，还有我姨妈。她的女儿王咏仙是著名的美人。那时候刚刚留学回国的金庆章（也是学机械的）拼命追王咏仙。为了追她，送了我不少东西，有小西装、玩具。最后他们终成眷属，是我爸爸、妈妈做的媒。抗战时金庆章坚守浙赣铁路，日本人到不了的地方一直保持运营通车，因此建立了功勋。战后当了浙赣铁路局的局长。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是大地主出身，不断挨整，被调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，后来又调去兰州铁道学院。

最巧的是1966年我家被抄家时王咏仙为了躲避运动从兰州来北京，住在我家。她的东西一起被抄。后来经过交涉她的东西发回给她了。更巧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党委书记钱心，是我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。金庆章的反革命分子定性就是钱心给定的。后来钱心因患脑瘤，50多岁就死了。他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死得最早的一个。整人的人死了，挨整的倒还活着。金庆章“文化大革命”后平反，补了一大笔钱，他活到90多岁。

在杭州我爸上班地方很远，在钱塘江的对岸，也就是萧山。每天上班先骑车到江边，再摆渡去萧山。晚上回家往往天都黑了。有时候天气不好，刮风下雨，钱塘江摆渡很不安全。我们全家担惊受怕。一

直到 1937 年钱塘江大桥建成，过江才变得安全。但那时我们家已经离开杭州去了长沙。大桥建成不过 3 个月就因日军来到，主动炸毁了。我爸在杭州的几年中还去过一趟日本，购买日本的机车。照规矩买机车的人可以得一笔佣金。但是我爸把佣金全部购买了更多的配件。他回国时给我带来一些日本玩具，我还有点印象。

我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，但是她聪明好学，中英文都很好。她在家里排行最小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，是外祖父的偏房所生。我父母都是有知识的人，可是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读书。那时候认为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学校的事，父母是不操心的。这和现在的想法非常不同。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爸带我坐长江船，在船上教我写阿拉伯数字，要写得端正漂亮，我至今受益。我家一共给我请过两次家庭教师，每次都只不过一两个月。我记得第二个老师姓潘，他教我读《古文观止》，读的是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和《秋声赋》。但是我更喜欢韩愈的文章，他的文章富有逻辑性。可是韩愈也不是逻辑完全严密的，我对他的关于千里马的文章提出了质疑。他认为只要有了伯乐，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但是他没有说到哪儿去找伯乐。他不过是把找千里马的难题偷换成了找伯乐的问题。而且我又从中推出更一般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。

从杭州出来我爸爸先带我去衡了衡阳，我在那儿的小学上学。爸爸在粤汉铁路机务处工作。因为他刚正不阿，得罪了官商勾结的一帮人。这帮人利用黑社会雇了流氓打手殴打我爸。显然我在那儿很不安全。于是他把我带去苏州、南京等地上学。到 1936 年爸爸在长沙有了稳定的工作，我们全家才搬去长沙。我的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。她督促我练大字。那时候是我们家生活最好的时候，家里有两个保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1937 年抗战开始，我家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，直到抗战胜利。

我的头一个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。那时候我只有 5 岁多，不会上厕所，要隔壁的姐姐照顾。别的事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。我不服气，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。

校长倒也没有认真，哈哈一笑了之。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，我就去了苏州、南京、衡阳等地上学。后来由于抗战，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，从长沙到桂林，到上海，又回柳州，在桂林、全州等地上学，后来到了重庆，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，是 1946 级的校友。总体来看这 12 年的中小学一共上了 13 个学校，其中小学 6 个，中学 7 个。

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，都是勉强及格，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。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，因为好奇心，记得最早看的是关于性方面的文章。初中我上的是桂林汉民中学。家是在柳州，要坐一夜的火车去上学，除了暑假寒假平时不能回家。那时候我 11 岁就离家住校。记得离家上火车时非常依依不舍，到了学校天天想家。我妈也非常不舍得，写信给我，说梦见我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。我接到这封信，恨不得马上投入妈妈的怀抱里。11 岁的孩子的确不会生活，不知道洗澡，不知道换衣服，几个月下来身上长了虱子，我还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虫子。最可怕的是我不懂得下水的危险性。有一次差一点盲目下水，如果下水，很可能会溺水身亡。那时候我们同班一个女同学就是溺水死的。学校组织人打捞尸首，晚上点了汽油灯通宵寻找。

中学一年级的時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，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，这几位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孩子。我上的这些学校都算不错，老师都还可以。但是因为频繁转学，学习很受影响。我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是在中学三四年级。但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是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一年。首先是数学老师特别好，他叫佢铁建，大家叫他佢老二。他教解析几何条理非常清楚。上课听讲，下课做作业，就完全明白了。考试就不害怕了。在南开我喜欢了音乐、体育，培养了我一生的好习惯。

我受的家庭教育有没有使我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？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。最近我得出结论，确实有所不同。有两件事可以说明：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。大部分人都站着，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，而我却等不及，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。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，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。这可以说明我与与众不同。其实大多数人

也会跟我一样，在传送道上往前走，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（有别人挡道）就停下来了，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。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，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。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，只要看一点，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。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，学历是高是低，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。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，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。

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。比如，我们 3 点 45 分就上了飞机，要飞 3 个小时。可是起飞不久，4 点多钟就开饭，乘务员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。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。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。而我要再等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。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。

我的这些不同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，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。1950 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，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。那纯粹是浪费时间。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。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，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“学习”，而我则拂袖而去。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。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，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。不怕与众不同，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特点，既因此而吃了很大的亏，也因此有巨大的得益。我认识几位大学教授，他们的水平都比我高，但是怕与众不同，学术上没有太大的成就，非常可惜。

第二章 成长

抗战中的磨难

在我开始记事之前，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。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，一个月拿近 500 块钱。但是 1937 年抗战开始之后，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。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。我记得大约在 1938 年，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。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。我们小学生去慰问，送面包给他们吃。有些轻伤的伤兵好一点之后就自由上街。他们有时候闹事、打人。他们的

心情很不好，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，担忧今后的生活怎么办。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。

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相当有名气的，教学质量很高，有一个大操场，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。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，而且他和我同年，我俩很可能是同班同学。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，他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。湖南人语文水平高，字写得漂亮。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。前几年我再去访问楚怡小学，已经今非昔比，显得相当败落。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。我在杭州的时候讲杭州话，在长沙的时候讲湖南话，后来去了广西，就讲广西话，去了重庆就讲重庆话。小时候学说话的能力极强。成年以后就不行了。我在北京住了半个多世纪，北京话中始终带有南方口音。

抗战以后，物价开始上涨。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，记得父亲在亨达利钟表店花了 100 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，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。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。那只表后来戴在我的手上。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。虽然修理过许多次，还走得很准。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，一直用到结婚后，买了一只日本表，性能比它好，就不再用了。这只表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以 15 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。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。后来知道卖得太便宜了。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古董卖的。

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，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。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。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，负担是很重的。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。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，经常吃不饱。每桌上的饭是定量的。吃得慢，别人抢先把饭吃完了，自己只好饿肚皮。至于吃肉，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。我经常走过校门口看见小摊上挂的油光锃亮的猪蹄子，馋得淌口水。在桂林汉民中学时，同班同学（忘记了名字）每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，（我家在柳州）他母亲总是炒两只菜，一只是炒肉丝，一只是炒鸡蛋，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。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，也爱别人的孩子，让我跟着吃。印象深刻，至今不忘。

八年抗战，吃一直是大问题，挨饿、嘴馋始终跟着我。附带说一句，抗战虽然十分艰苦，但是没有大规模饿死人，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，也只不过几万，顶多十几万，绝不会有几百万、上千万。这说明，即使在战争条件下饿死人也并不普遍。

从 1941 年到 1946 年的 6 年中学时代，我是在抗战时期度过的。抗战的大背景，决定了生活的动荡不安。我 6 年的中学时期换了 7 所学校。其中 1944 年日寇进逼桂林、柳州，直迫贵阳，我们从桂林逃到贵阳是最大的一次转移。那时我正在桂林智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。因为风声日紧，我随着父母弟妹撤退到了贵阳。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，也是让我这个 15 岁的孩子迅速长大的过程，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日本侵略军不但吞并了半个中国，而且出兵东南亚诸国，兵力分散，力不从心。但为了打通华中通往越南的通道，日本又出兵 10 余万人攻打衡阳、桂林、柳州、南宁。国民党有数倍于日寇的兵力，但政治的腐败使得军队缺乏战斗力。除方先觉将军固守衡阳 47 天之外，没有形成抵抗力量。日军长驱直入，占领了桂林、柳州之后，于 1944 年冬，日本仅用了 3000 骑兵，驱赶几十万中国军民沿着黔贵线撤退，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可耻的一页。从柳州到贵阳的黔贵线当时只修了全线的 1/4，火车只通过金城江。从衡阳、桂林、柳州撤退下来的大批机车车辆及疏散物资，一齐拥到了百余公里的铁路线尽头。一切可以停放车辆的转道上都停满了车辆，车站上堆满了物资，但前线撤退的车辆仍源源不断地来到。不得已只好修了一些通向山崖河谷的专用线，将车辆连同物资推到山谷和河沟里去。这些物资都是被认为最有保留价值的，所以才历尽辛苦把它们运出来。早知这样的下场，当初何必费劲。

火车按理说比汽车的运输能力大得多。可是由于线路的建筑标准低，坡度很陡；机车用的煤质量太次，烧不上汽油；机车车辆维修状态很差，这种种原因使火车的运输能力锐减。后来火车也走不动了，许多人改坐汽车。可是大部分车辆都是老旧破车，零配件供应不足，

状态极糟，再加汽油供应异常紧张。到最后大部分人只好扶老携幼，徒步撤退，其狼狈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。日本军队于 11 月占领了桂林和柳州。我方几十万军民沿公路撤退。本来广西、贵州很少下雪，那一年天公不作美，忽然下起雪来，难民饥寒交迫，疾病加疲劳，死伤无数。

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，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，而是乘人之危，彼此算计。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，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，就被人偷走。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，离开公路，走小路上山寨躲避，被当地百姓收留。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，非要逼她成亲，否则几十口人性命难保，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。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。后有敌军追赶，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，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，从柳州到贵阳几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，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。

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，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 3000 名骑兵，既无重型作战装备，甚至缺乏粮草辎重。日本人跺一下脚就能把中国人吓得栽一个跟斗，而且让中国人自相残杀。为什么？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“一盘散沙”。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，解放战争中唱的一首歌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确实是不错的。

然而，团结的背后是什么？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支持和道德约束，还是出于对权威的屈从，两者本质是不同的。同样是抗战中的故事，在平型关大捷中，日军伤亡惨重。我方战士出于人道考虑，将一受伤日军背下火线医治，不料被日本兵咬下耳朵。日本兵的这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很典型地说明了，何以日本军队能够打胜仗。中日两国精神的对比反差太大了。日本人的这种精神也可解释何以他们能制造出质量最好的汽车、音响、摄像机，但是日本兵咬八路军耳朵的事，也说明了日本人把优良的精神用错了地方。这也是时至今日，东南亚诸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仍不放心的原因。

我们沿黔贵线撤退时，我的一班高年级同学曾自己组织起来，上山去打游击。其实，既没有枪支弹药，又没有作战知识，怎么打得了仗？后来国民党到贵州地区征召青年入伍，他们就应召，受训后去缅甸与日军作战，成为青年远征军的一部分。这个班在我的许多同学中是境遇最惨的一班。除了少数几人跟着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，大多数留在国内。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部队，成为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。好几个人被整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现在他们写回忆文章时，认为当年应征参军抗日，是一生所作决定中最大的错误。做一个中国人多么可怜啊！黔贵线撤退，对日作战，政治运动，都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才遭遇的。

人类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，变得略为聪明一点了，人权的思想在全世界得到公认。过去侵占别人的土地现在要让出来，抢了别人的珍贵文物现在要归还；奴役了别国的百姓，强迫别人当慰安妇，现在要赔偿。以后谁再要用强权去侵犯别人，将被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群起而攻之。这可以说是一点进步，但是世界能否保持和平，这还难说。争夺财富和资源的战争可能性似乎变小了，但当今因为民族、宗教、历史冤仇的战乱丝毫也不见少。

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？再碰到战争、天灾人祸、金融危机、政治运动这些意外，我们能否处乱不惊，团结起来战胜困难？杀人越货，借钱不还。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，大多数人还是好人。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，随地扔脏东西，排队加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。事情虽小，但到了紧要关头，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。我已经老了，来日无多，恐怕还能在平安中度过余生。我的身后将如何，仍是一个大问号。其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希望青年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，为自己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。

直到抗战胜利，学校的伙食忽然大大地改进。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。每顿饭都有荤菜。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。同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卖，有奶油、冰激凌粉、蛋粉等，价钱便宜，营养丰富。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，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，生活又走下坡。那

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大，食堂的伙食很糟糕，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。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 ration（配额给养），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，重量不过一磅多，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。里面有几片饼干，一个肉罐头，一块巧克力，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。盒子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，每次打开，像挖宝藏似的，想发现一些新东西。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，还有穿的用的，有雨衣、皮鞋、军服、军毯、睡袋、信纸、信封等，给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，缓解了物资供应紧张的压力。对比之下，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。那时候上大学是免费的，不但免费，而且还有伙食津贴。

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吃巧克力。自从 1940 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内地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。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，下飞机头一件事就是在机场的零售店买一块巧克力吃。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。不过年老了，不宜多吃糖。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。整个暑假因为我弟弟得了盲肠炎，我陪伴他两个多月，没有时间复习，所以考得很不理想，只是勉强被录取，而且还取在工商管理系。到二年级才转到机械系。

抗战胜利后的一年，全国经济很快恢复，大家的生活很快变好。我父亲在 1944 年被派去美国准备战后援华铁路物资的接收，他从重庆出发，飞越喜马拉雅山，在印度登船跨太平洋到美国。由于怕日本人的潜艇攻击，在船上每天都要练习逃生。那次铁路系统派去美国的一共有 100 多人，大部分是实习生。可见 1944 年胜利已经在握，开始考虑战后的事。这批人是后来铁路建设的重要人才。可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不喜欢西方留学生，他们的命运都不好，更谈不上重用。

我父亲在 1946 年回国，带回大批铁路机械物资，有机车、车辆、配件、工厂的设备。由于在国外拿的是国际标准的工资，他回国时带回来许多衣服、鞋、手表、书籍，我家的物质条件大大地改善。那时候我正好上大学一年级。但是不久内战开始，国民党搞通货膨胀，家里大部分的储蓄都损失了。所以我大学 4 年的生活并不宽裕，要靠做家教维持。

南开中学

重庆南开中学是 1936 年张伯苓创办的。应该说这是张伯苓的远见和运气。一年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，接着国民党政府把政府所在地从南京迁到重庆，重庆很快变成了政治文化经济中心，许多党政要员和文化名人聚集于重庆。南开中学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所中学。

当时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都在南开上学。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同学就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外甥，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。而且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也是完全平等的，都要凭本事考进去的。我不是政府要员的子女，我也考了两次，头一次没录取，第二次才通过，进了南开的大门。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并不知道，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。学校从不趋炎附势，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。这和现在个别家长开着高级轿车送子女上学，比阔气、比级别的风气截然不同。南开同学个个有志气，有独立奋斗的精神，可能和学校的平等气氛有关，和家长不培养子女的特权思想有关。

重庆南开中学直接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办学，但是学校里有充分的民主气氛。当时国民党办的《中央日报》和共产党办的《新华日报》对学生都是免费赠阅的。我所在的班上有些关心政治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。那时我的思想还很幼稚，不懂得政治，也不关心他们辩论的结果。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，讨论政治是老百姓的权利，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。发表任何一种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能得到保护。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当时的民主壁垒之一的上海交大，更加强了我的民主意识。抗战结束以后，国民党倒行逆施，控制言论自由。我的一位同房间的同学，就因为同情共产党，反抗国民党的控制，被抓进去，最后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。后来国民党为了争统治权，中国人打中国人，极其不得人心。上海交大发动了“反饥饿、反独裁、反内战”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，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。国民党的腐败无能，道理讲不过共产党，终于败退台湾。